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初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6冊

中國古代藏書管理

李家駒 著

南宋館閣典籍考

李健祥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中國古代藏書管理，李家駒著／南宋館閣典籍考，李健祥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工作坊，2005〔民 94〕

目 2 +96 面 + 序 1 + 目 1 +73 面：19×26 公分（古典文獻研究
輯刊 初編；第 9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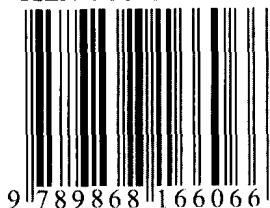
ISBN：986-81660-6-3（精裝）

1. 藏書－中國－歷史 2. 圖書－中國－南宋（1127-1279）

020.92

94019001

ISBN 986-81660-6-3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初 編 第 六 冊

ISBN：986-81660-6-3

李家駒：中國古代藏書管理
李健祥：南宋館閣典籍考

作 者 李家駒／李健祥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工作坊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工作坊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 版 2005 年 12 月

定 價 初編 40 冊（精裝）新台幣 6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中國古代藏書管理

李家駒 著

作者簡介

李家駒，民國 48 年生，台灣大學圖書館學系畢業，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圖書文物組碩士。曾任職於台北市立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現任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大陸資訊及研究中心科長。

提 要

本書題名為「中國古代藏書管理」，內容包括中國古代政府與民間的圖書收藏情形，以及各種自然、人為書害的原因與防治方法、藏書環境的控制、書籍的整理與利用和污損殘缺圖書的修補復原技術等。時間上，以宋元明清四朝為主，但在此時期前後有關的史料，一併加以蒐集論證，同時有關於本題的現代圖書館學資料與科技資料，亦參考引用且相互比較說明。

此外，由於自東漢以後，紙張逐漸成為主要的書寫記錄材料，而書籍的質料對圖書的保存又有直接的影響，因此紙張、用墨及其他製書材料的製造、性質和改進，亦專列一章討論，以說明其間相互關係。最後，試行探討古代圖書典藏所採用的方法與原則，在現代圖書館典藏工作中的實用性，希望能使本書能有實務上的參考價值。



南宋館閣典籍考

李健祥 著

作者簡介

李健祥：37 年 5 月 1 日 政治大學中文系：中文研究所畢業 現任教：中國醫藥大學

提 要

本書主要敘述及考證之重點為南宋一朝之館閣典藏及校理圖籍之情況。

第一章敘述靖康、建炎間之圖籍散佚，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若以此為隋秘書監牛弘所述圖書五厄之後，圖書復有五厄之一。

本章之第一節敘述私家藏書之播亡，蓋以私家藏書與館閣藏書，互為脣齒；私家藏書散失後，館閣藏書所受之影響亦大。本節引李清照《金石錄後序》、葉夢得《避暑錄話》等所言私家藏書播亡之情形。第二節言館閣圖籍之散佚，首引《文獻通考·經籍考》等文，以明北宋一朝館閣藏書情況，再為敘述靖康、建炎間之圖籍散佚。而圖籍散佚之主因，一則為金人之掠奪，再則亡佚於轉運中。

第二章敘述南宋之訪書，南宋初雖以圖籍因靖康兵亂散佚殆盡。然經君臣下上戮力搜訪，於孝宗淳熙年間編《中興館閣書目》時已聚書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其後寧宗嘉定間編《中興館閣續書目》又得書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合計較之北宋政和間之《秘書總目》七萬三千八百七十七卷，雖稍有不及，然已屬難能矣！

本章第一節敘述高宗一朝之訪書，第二節敘述孝宗及孝宗以後各朝之訪書。第三節敘述南宋館閣訪書所遭遇之困難及其得失；南宋訪書所遭遇之困難計有（一）、獻書賞格未立及獻書恩賞微薄，（二）、有司執行不力，（三）、懼以獻書賈禍而不敢投獻諸端。訪書得失則以其數不踴前朝為其得，而秘府所存多為近代著述，奇秘闕逸較前少損為其失。

第三章言南宋館閣之藏書情形，第一節敘述各藏書處所之建置沿革及藏書概況，第二節為南宋館閣藏書之檢討。

第四章敘述南宋館閣之校書，於此可分二方面言之，一為專校經史群書中之某一部書或某類書；二為廣校館閣所收郡國士民所進獻圖籍。

第五章敘述南宋末年之圖籍散佚：南宋末年館閣圖書首毀於理宗紹定四年之臨安大火；其後元人南下，又盡失於其有計劃之掠奪。

以上為本書各章之內容大要。

自序

名山之業，石室之藏，自古有之，而述者蓋尠。甚或僅爲偶及，或傷其瑣細，固未嘗有專及於此者。曩昔，聆周駿富老師「中國圖書館史」之業，周師曾有〈北宋館閣典校圖籍考〉一文，載《台灣大學文史哲學報》中，言北宋館閣搜訪、藏、校圖籍之事甚詳。時值筆者以研究南宋曾慥《類說》之便，於南宋文獻亦多涉獵，知南宋一朝以靖康亂後，館閣藏庋，散亡殆盡；而經君臣上下，戮力搜訪，所得甚夥，右文之風，誠有足多者。而其間之圖籍播亡情形及訪書之勤，藏書之制，乃至於校理圖籍之事，均有亟待吾人探索者在焉。故敢不憚鄙陋，撰爲本文。蓋思以此或可補「中國圖書館史」中之一環也。

本文寫作期間，頗爲「文獻不足」所苦。尤以南宋自孝宗以後，史料極乏，雖則遍爲搜訪有關載籍，甚及各家別集，筆記小說，其不可得者仍多。更兼以筆者才學疏淺，闕漏之處，自爲難免，大雅君子，幸教正之。

二〇〇五年七月



目

錄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圖書典藏的重要性	2
第二節 歷代書籍的聚散	3
第三節 研究圖書典藏工作的目的	6
第二章 書材原料、製造方法與書籍保存的關係	9
第一節 紙與造紙技術	10
一、原 料	11
二、製造過程	11
第二節 墨及其他材料	15
一、墨及其製法	15
二、其他製書材料	18
第三章 各種書害因素	21
第一節 物理化學因素造成的書害	22
一、火 災	22
二、水 災	25
三、其他環境因素所造成的書害	26
第二節 生物因素造成的書害	29
一、書 蟲	29
二、書 黴	32
三、其他生物性書害	33
第三節 人爲因素造成的書害	34
一、兵燹與匪亂	34
二、禁燬與竄改	39
三、管理不善與子孫不肖	41

第四章 書害的防治及典藏管理的方法	45
第一節 製書材料與方法的改進	45
第二節 藏書樓位置的選擇與建築設計	48
第三節 藏書的管理	54
一、藏書的編目與庋架	54
二、藏室管理	55
三、曝 書	59
四、惜 書	60
第四節 破損書籍的裝訂與修補	62
第五章 藏書的利用與刊佈	65
第一節 校讎鈔補	66
第二節 借閱流通	68
第三節 刊刻流傳	73
第六章 古今典藏管理方法的結合與應用	77
第一節 書籍質料	78
第二節 建築設計	80
第三節 典藏環境	82
第四節 閱覽流通	85
第五節 複製與刊印	86
第七章 結 論	89
參考書目	91
圖表目次	
圖一：造紙工藝流程圖	14
圖二：衣魚圖	30
圖三：人參蟲及粉囊蟲圖	31
圖四：范氏天一閣平面圖	49
圖五：清文淵閣平面圖	51
圖六：皇史宬正殿圖	52
表一：歷代重要書目著錄典籍數量表	5
表二：各主要城市季溫度表	27
表三：各主要城市季濕度表	27



目 錄

自序	
第一章 靖康建炎間之圖籍散佚	1
第一節 私家藏書之播亡	2
第二節 館閣圖籍之散佚	4
第二章 南宋之訪書	13
第一節 高宗之訪書	14
第二節 孝宗及孝宗以後之訪書	22
第三節 訪書所遭困難及訪書得失	27
第三章 南宋館閣之藏書	35
第一節 各藏書處所之建置沿革及藏書概況	35
第二節 南宋館閣藏書之檢討	50
第四章 南宋館閣之校書	55
第一節 專校經史中之某類書者	56
第二節 廣校秘府搜訪書籍者	57
第五章 南宋末年之圖籍散佚	63
第一節 紹定之火厄	63
第二節 元人之掠奪	65
第六章 結語	69
參考書目	71

第一章 緒 論

人類文明的進步，得自於知識與經驗的不斷累積發展。在原始時期，知識經驗的傳播，靠人的記憶力和口耳相傳，而記憶力有限，又不免因為時間久遠而淡忘模糊，有所訛誤脫落。所以要靠一些輔助記憶力的方法來協助，於是逐漸有了結繩記事和模仿山川鳥獸圖案的文字畫出現，有了這些具體符號，人類意思的表達與記憶傳承，就方便正確多了。這些圖形或符號，經過時間累積和使用便利的要求，漸漸脫離具體事物的描畫，而成為思想意象的代表，以後不斷的改良演進，一步步的變化形態、擴充詞彙，而成為今日所使用的文字〔註1〕。

代表各種形象意思的圖案或文字發明後，必須要有記錄的材料，才能傳播交流。從自然界採取的石塊、樹皮、獸皮和獸骨，隨著知識和工藝的進步，開始有了專門為記錄文字而製造的材料，像是簡牘縑帛等等。但是這些記錄用的材料，不是太粗糙，就是太昂貴，或是太笨重，並不是十分適合書寫和傳播。紙張發明後，因為價廉質輕的優點，取代了不適合的材料，成為書寫記錄的主要工具；印刷術的發明，更是知識傳播的劃時代里程碑，從此書籍傳刊便利，大量而價廉的各類圖書出版，促進了人類文明的快速進步。

造紙法和印刷術都是中國人最早發明的，這與注重文治教化的傳統有很大的關係，這兩項偉大的發明，也使中華文化更加蓬勃興盛，綿延千年。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古籍，不論是古本、重刻、影印或是傳抄，都是前人為了知識的保存和傳播所作的努力，也就是靠著這些人類活動記錄的保存及傳播，文明才得以不斷的發展進步。

〔註1〕吳哲夫，《書的歷史》（台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民國73年），頁10～12。

第一節 圖書典藏的重要性

書籍之所以被重視而珍藏，是因為書記載了人類過往活動的記錄、智慧思想的結晶和發明創造的成果。這些寶貴資產，如果不能形諸於筆墨記錄，僅靠頭腦記憶，終不免訛誤脫落，而難以完整保存，供後人研究參考。《隋書·經籍志》說：「夫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緯陰陽、正紀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註2〕。」正足以說明這個道理。

在紙張發明前，圖書的形式為簡牘縑帛，非重即貴，且傳抄費時，因此官府之外，私人藏書較少。私人藏書的風氣，在唐朝發明印刷術後，至五代逐漸形成，再至宋而私家藏書大盛〔註3〕，此後官私藏書雖各有聚散，但藏書風氣仍歷千餘年而不衰。清人張潮曾說：「凡事不宜刻，若讀書則不可不刻；凡事不宜貪，若買書則不可不貪〔註4〕。」而古人因為愛書藏書成癖，以至家貧如洗，衣食無著，妻女飢寒，「惟有文書溢几簞」者，所在多有〔註5〕。

歷代這些豐富的官私藏書，對中國學術文化的貢獻與重要價值，歸納來說有：

- (1) 保存圖籍，留傳後世。
- (2) 綴輯零編，裒集遺文。
- (3) 校讎眾本，是正舛誤。
- (4) 借閱流通，嘉惠學林。
- (5) 刊佈善本、輯印叢書〔註6〕。

由此可知藏書不只是一人一家一朝一代之事，也是文化傳承，民族延續的重要工作。

近世西洋圖書館學傳入，其精義在以科學方法整理圖書資料，以廣為流傳、便於利用為目的，期能發揮書籍資料的最大功用。相形之下，中國古代藏書似乎將書籍視為珍貴私產，以防散佚為首要，「藏書樓」反而變成落伍保守的同義詞。事實上，過去如此藏書，其目的還是在於使書籍保存久遠，不因外力的影響而散失。因為書籍本為脆弱之物，容易因為種種因素而燬佚，而書中所記載的，又是極為珍貴的智慧結晶，在古代科技、制度及環境均不理想的情形下，對書籍典藏的重視和管理的嚴密，實在是必然的結果，這種情形中外皆然。而且若無歷代藏書者妥善的保管，今日得見的古書，恐怕早已灰飛煙滅；更何況除了保存圖籍以防散佚外，藏書還有

〔註2〕《隋書·經籍志》，卷三二（台北市：鼎文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頁903。

〔註3〕潘銘燊，〈宋代私家藏書考〉，《華國》，六期（1971年7月），頁203。

〔註4〕清張潮，《幽夢影》（台北市：中華書局，《國學珍本文庫》本）。

〔註5〕殷登國，〈藏書癖〉，《新書月刊》，二六期（民國72年12月），頁26～28。

〔註6〕潘銘燊，前引文。

蒐集遺文、校讎勘誤、編製書目、刊佈善本、嘉惠後學的積極功用，豈能斷章取義，抹殺了前人的苦心及貢獻。

以今日而言，「台灣地處亞熱帶，四面環海，高溫多雨，空氣潮濕，夏季特長。害蟲、細菌、齧齒動物滋生甚速。這對書籍的保存，顯然極為不利〔註 7〕。」在這種環境中，古代藏書所遭遇到的各種問題，幾乎全部存在於台灣地區的書籍資料典藏工作之中，因此如何吸收前人的經驗方法，加上近代科技的研究，在有限的人力與經費下，做好典藏維護的工作，確為一值得研究的課題。

第二節 歷代書籍的聚散

中國人典藏文獻的歷史久遠，由近代的考古挖掘，證明在殷商時已有藏量達二萬餘片龜甲的窖藏，和供閱覽時使用的穴窖存在〔註 8〕；周朝的書冊則是「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註 9〕。」可見商周之時，已有專門典藏文獻的官方機構，並設官分職，專人負責。私人藏書最早的記載，則是《莊子·天下篇》中：「惠施多方，其書五車〔註 10〕。」然此時距殷商已約千年，周朝學術又頗為發達，因此私人藏書的起源應更早於此，只是未見於記載而已。

「一個國家的典籍，是全民族經驗與智慧表現於文字的結晶。隨著文化的進步，文字語彙越來越增加，圖書的數量也越來越增加〔註 11〕。」所以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王官之學散入民間，諸子百家興起，各類典籍的數量大為增加。《漢書·藝文志》中，著錄了六百七十八部，一萬四千九百九十四卷典籍〔註 12〕，這還是經過秦始皇焚書禁學，和王莽末年長安兵亂，「宮室圖書並從焚燼」〔註 13〕的兩次書厄之後，所存餘書籍的統計。而其著錄的來源主要為「東觀」所藏〔註 14〕，可見當時中央政府的藏書已相當可觀。

〔註 7〕黃章明，〈如何使善本書延年益壽〉，《出版與研究》，二期（民國 66 年 7 月），二版。

〔註 8〕蘇瑩輝，〈從考古學上的新發現論圖書館起源〉，《圖書館學報》二期（民國 49 年），頁 35～36。

〔註 9〕前引文，頁 38。

〔註 10〕郭慶藩，《莊子集釋》（台北市：漢京文化公司，民國 72 年），頁 1102。

〔註 11〕梁容若，〈中國歷代典籍的總合觀察〉，《東海學報》，九卷二期（民國 57 年 7 月），頁 19。

〔註 12〕前引文。

〔註 13〕《隋書·牛弘傳》（台北市：鼎文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頁 1298。

〔註 14〕周駿富，〈中國圖書館簡史〉，中國圖書館學會編，《圖書館學》（台北市：學生書局，民國 60 年），頁 88。

漢代除了東觀外，官府藏書的處所還有石渠閣、天祿閣、麒麟閣、蘭臺、石室等機構，以後歷代均有設置圖書典藏的機構，如同今日的國家圖書館。如魏有秘書監；晉有監秘書省；南北朝有秘書監、文德殿等；隋有嘉則殿、修文殿、觀文殿；唐有秘書省、弘文館、乾元殿；宋有崇文院（即昭文館、史館、集賢院三館）、秘閣、太清樓等；元有秘書監；明有文淵閣、皇史宬；清有四庫七閣、摛藻堂、內閣等〔註15〕。歷朝官府藏書自萬餘卷至數十萬卷不等，每為一時之盛，但因接近政治權力中心，遇有變亂兵禍，動輒遭劫，以國家之力多年蒐集聚積的珍貴典籍，往往不堪兵火等災厄而盡付淪喪。歷史上著名的典籍災厄有：

- (1) 秦始皇三十四年下詔焚書。
- (2) 王莽之末，長安民兵焚未央官，中秘之書付之一炬，化為灰燼。
- (3) 東漢末年，董卓之亂，典籍蕩然無存。
- (4) 西晉秘閣藏書二萬九千餘卷，盡燬於八王之亂。
- (5) 南北朝時，宮中藏書先燬於侯景之亂，再燬於蕭繹之手，七萬餘卷僅餘十之一二。
- (6) 隋開皇（藏書）之盛極矣，未幾悉灰於廣陵。
- (7) 唐開元之盛極矣，未幾悉灰於安史。
- (8)（唐）肅代二宗荐加糾集，黃巢之亂復致蕩然。
- (9) 宋室圖書，一盛於慶曆再盛於宣和，而女真之禍成矣。
- (10) 三盛於淳熙四盛於嘉定，而蒙古之師至矣。

此即中國文獻史上著名的「圖書十厄」〔註16〕，每次遭燬佚的書籍多達數萬卷或十數萬卷。而在宋以後至清末，因為政治因素或戰亂造成的書厄又有：

- (1) 明崇禎甲申之亂，李自成入北京，明內府秘閣所藏之圖書六萬餘冊皆付於火。
- (3) 清入主中原，先後禁毀書籍近四千餘種，另妄刪妄改之書亦難計數。
- (3) 歷代官府藏書最盛的清代，經太平天國、英法聯軍及八國聯軍諸事變，四庫七閣三燬一殘缺，《永樂大典》散燬殆盡，內府所藏書籍檔案亦遭嚴重波及〔註17〕。

〔註15〕 陳尤鼎，〈中國圖書館史料輯要初稿〉，《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二八期（民國65年12月），頁23～35。

〔註16〕 前五厄由隋牛弘提出，見《隋書》卷四九〈牛弘傳〉；後五厄由明胡應麟補述，見胡著《少室山房筆叢》卷一。

〔註17〕 李孟晉，〈中國歷代書厄概觀〉，《HKLA Journal》五期（1980年5月），頁77～87。

以上這些書厄，主要是由大規模的兵燹或查禁等政治因素，造成官府藏書的散失，「然以中國疆土如此之大，民間藏書總不會完全根絕的〔註 18〕。」但是私家藏書因為子孫不肖，管理不善或難抗水火兵盜，經年累月積少成多，散失的數量也是相當驚人，這也是古籍流傳至今甚為稀少的另一主要原因。這些私家藏書散毀的事例，將留待第三章中，再就其原因逐一列舉說明。

綜而言之，中國歷代公私藏書的散佚，可歸納為以下四點：

- (1) 受厄於獨夫之專斷而成其聚散；
- (2) 受厄於人事之不臧而成其聚散；
- (3) 受厄於兵匪之擾亂而成其聚散；
- (4) 受厄於藏弄者之鮮克有終，而成其聚散〔註 19〕。

至於歷代典籍散佚具體數字的推斷和說明，可以於下表窺見一斑：

表一：歷代重要書目著錄典籍數量表〔註 20〕

書目名稱	年代（西元）	距上次著錄時間（年）	書籍種類	增加數量	增加倍數
漢書藝文志	23		678		
隋書經籍志	617	594	6150	5472	8.9
宋史藝文志	1276	659	9549	3399	1.55
四庫總目 （含存目）	1782	506	10585	1036	1.11

由漢至隋近六百年，典籍數量成長約九倍，映之人口增加，文化發展的現象，應為可信數字；但隋至宋六百五十餘年，其中又有雕版印刷術的發明，而典籍數量的成長只有一倍半。《宋史·藝文志》固然未收全部書冊，但如此低的成長倍數，其中必有大量的書籍流失；宋至清修四庫時期止，又五百年，書籍增加率反而更低，僅有一千餘冊而已。另外，如據今人張舜徽的推斷，現存古典文獻數量，包括各種單行刻本、地方志、叢書中的單種文獻、小說、戲曲、佛藏、道藏、譜牒及金石拓片，僅約有八萬種〔註 21〕。以漢至隋，六百年成長九倍計算，依此比率，至清末應有書五十餘萬種，即使扣去因時間淘汰的通俗書刊及劣書，再從寬計算未被上述四

〔註 18〕張舜徽，《中國文獻學》（台北市：木鐸出版社，民國 72 年），頁 25。

〔註 19〕陳登原，《中國歷代典籍考》，又名《藝林四劫》或《古今典籍聚散考》（台北市：盤庚出版社，民國 68 年影印），頁 16。

〔註 20〕梁容若，前引文。

〔註 21〕張舜徽，《中國古典文獻學》（台北市：木鐸出版社，民國 72 年），頁 15～16。

種書目收錄的文獻數量，則自古至今流失的典籍至少在十萬種以上，這實在是中華文化無法彌補的大遺憾。

歷代珍貴典籍屢遭橫禍，無怪杜定友先生曾嘆：「水火蠹魚之害，兵戈盜劫之災，紀不勝紀，是因災禍之來不可避免，而歷代藏書不得其法，亦無可辭其咎焉〔註 22〕。」杜先生有此慨嘆，實痛心於豐富的文化資產，竟不得永傳後世，確為至情之言。然藏書之人，多讀書愛書，豈有不知鑑往知來而力求妥善保管，任令其湮滅的道理？其實藏書者多有管理方法，只是因為世道變化、兵火災害和子孫不肖，藏書才遭散佚，藏書者之痛心無奈可以想見。

第三節 研究圖書典藏工作的目的

古人既好藏書，書籍一多，自然要有管理方法，才能便於取閱並使之傳存久遠。清黃宗羲曾說：「讀書難，藏書尤難，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註 23〕。」可知圖書典藏工作的不易與重要，如果典藏不善，不但不能達到供人閱覽研究的目的，還會因為霉爛、蟲蛀、污損、散佚、焚燬而使寶貴的文化資產無法留傳後世〔註 24〕。所以對典藏技術的講求，與典藏環境的管理，不能不特別注意。歷代有名的藏書者對其所藏，多各有其管理方法，越到後代，因為鑒於前人藏書散佚，造成了無可彌補的遺憾，所以管理方法越趨嚴密週詳，進而闢室建樓儲之，以求安全妥善，留傳久遠。

殷商時期，既已有藏二萬餘片甲骨的窖穴，則必有某種管理方法，否則只靠記憶，是很難在眾多而雜亂的甲骨中找出所需，證之「河南安陽殷墟出土之甲文中，尾尖之右方往往有『編幾』、『冊幾』或『絲幾』之文，據推考為龜甲之編號，足規當時之典藏皆有順序，非隨意散置〔註 25〕。」而商周之時，官府所藏圖書，應已著錄編目，只是未得見史料記載而已〔註 26〕。

西漢劉向、劉歆父子作《別錄》、《七略》，正式將各種冊籍分類列名，一般視為中國目錄學之始。以後近兩千年間，各家分類互起，或四部或七部，其目的不外是將各種圖書分類部次，以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然後「即類求書，因書就學」。這個目的反映到實務上，就是要將書籍分類度藏，並按一定次序排列，妥善保管，

〔註 22〕 杜定友，《校讎新義》（台北市：盤庚出版社，民國 68 年影印），頁 111。

〔註 23〕 （清）黃宗羲，《南雷文約》，卷四（台北市：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本）。

〔註 24〕 薛作雲，《圖書資料學》（台北市：文津書局，民國 68 年），頁 144。

〔註 25〕 昌彼得，《中國目錄學講義》（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民國 62 年），頁 36～37。

〔註 26〕 前引書。